

文献学与法国学界查理七世历史叙事的科学转向

高 昱

【提要】 在法国史学史研究中,学界通常认为兰克学派的传入促进了法国学界历史研究的科学化,这一结论忽略了其他学术群体的贡献。几乎与兰克学派传入法国同时,文献学家们与以亨利·马丁为代表的浪漫派历史学家就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公正性,展开了一场大战,这些文献学家反对后者对查理七世过于主观化、贬低化的叙事,并通过校勘史料、撰写专著等方式,力求公正、客观地评价查理七世。文献学家们留下了诸多书评、专著等材料,清晰地体现了他们追求客观、如实直书的学术追求,他们的学术活动也促进了19世纪法国史学的发展。查理七世历史叙事科学化转向的个案表明,除了兰克主义者,文献学家也为法国史学的科学化转向起到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 法国史学史 查理七世 文献学 史学科学化

史学的科学化^①是近代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思潮,也是当下史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议题之一。对于这一转向,中西方学界通常认为是受到了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和推动。^②就法国史学史而言,学界也多秉承这一观点,并已就其起源、过程、特征等方面作出诸多阐释,建立了较为严谨的叙事框架。19世纪前期,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曾先后担任法国教育大臣与首相。在任期间,他大力支持向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投入预算,鼓励历史学家创作。这些措施激发了大革命后一两代人对历史的学习热情,为法国史学的专业化打下了良好基础。受这一环境影响,19世纪中后期,法国涌现出埃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夏尔·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等一大批优秀学人,他们接受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与史学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历史研究,成为法国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推手。^③

但是,这一框架在晚近的几十年中受到部分学者的挑战。夏尔-奥利维耶·加博内尔指出,将

① 关于“史学的科学化”,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在《外国史学史》中的相关阐释:“模仿科学家的方法,确证史料的真实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描述历史的变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页。

②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7—35页;陈黄蕊:《史学科学化发展轨迹》,《学术界》2017年第1期。

③ 关于基佐对法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2—349页;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 Arnold J. Pome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1-75。关于拉维斯、莫诺等史学家对法国史学研究科学化的推动,参见 Charles-Olivier Carbonell, *Histoire et historiens: une mutation idéologique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1865-1885*, Privat, 1976, pp. 401-408, 418-435; 顾杭、庞冠群:《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影响探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此外,以拉维斯为代表的兰克主义者对法国历史教育体系化的推动,也被认为是法国史学科学化重要方面。参见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514页。

埃内斯特·拉维斯、夏尔·瑟诺博司等兰克主义者称为“实证主义史学家”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一命名上的判断导致学界忽视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真正源头——法国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以降的实证主义哲学传统。^① 198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法国史学的科学转向中，法国本土的、在拉维斯等人进入法国学术中枢之前便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菲斯塔尔·德·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也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② 这些研究表明，法国学界开始重视法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内源性因素。

本文旨在对这一框架展开补正，聚焦的对象则是一个在19世纪法国史学史研究中相对被忽略的群体：以国立文献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③为学术阵地的文献学家。19世纪，文献学家人数逐步增加，他们对档案、编年史等一手史料的熟悉程度远超浪漫主义史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浪漫主义史学家对查理七世等人物的历史叙事与其在一手材料中所见的真实面貌大相径庭。于是，他们通过撰写书评、专著、书信等方式不断与浪漫主义史学家展开探讨与论战，并撰写了数部基于一手史料的研究成果，重新构建了查理七世的历史叙事。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文献学家们强烈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充分利用档案、编年史等一手材料公正地叙述历史，真实还原查理七世时代的政治发展、制度更迭与社会风貌。这些书评、专著等材料亦清晰地体现了这批文献学家们的治学思想：如实直书、论从史出。他们的出现与兰克学派传入法国几乎同时，但有着清晰的源于自身学术训练的特征。

本文以19世纪中期的一桩爆发于文献学家与浪漫派史学家之间的学术论战——查理七世历史叙事论战为切入点，以这一论战中双方留下的书评、书信、专著为材料基础，探究文献学家在19世纪法国史学科学化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就查理七世相关历史叙事的科学转向来看，它不是由拉维斯等兰克主义者而是由文献学家推动的。文献学家的学术活动对法国史学的科学转向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法国史学科学化的内生性因素之一。

一、浪漫主义史学家笔下的查理七世

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史学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多致力于梳理、阐释法国从古到今的历史演变，并以此探寻理性、自由对法兰西民族的意义。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从复辟王朝到第二帝国初期，法国史坛出现了众多的通史作品，这些通史作品几乎都对15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史作过阐述。15世纪上半叶是法国多灾多难的时代。141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大败法军。此后十余年，法国人节节败退，在布尔日建立了以查理七世为核心的政权顽强抵抗，仍屡战屡败。1429年，贞德带领法军展开反攻，1430年被英军俘获，次年被判为女巫并送上火刑架。19世纪上半叶的通史作品在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中，通常以贞德作为写作的绝对中心，她多被塑造成一位英武、神圣的伟人形象，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将倾，带领法兰西王国转危为安。其他的人物则在这些通史文本中笔墨较少，均作为“配角”出现。

① Charles-Olivier Carbonell, *Histoire et historiens: une mutation idéologique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1865 - 1885*, pp. 401 - 408.

② Claude Nicolet, "1889, Réflexions sur Fustel de Coulang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iffusion de Boccard, 1989, pp. 721 - 726.

③ 其名称在学校建立后多次变更，现名为国立文献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本文在写作中简称“文献学院”。

国王查理七世也是其中的“配角”之一。在众多配角中,他通常被描绘为一个负面、阴暗、无能的国王。让·德·西斯蒙蒂是这一时期较早开展通史写作的历史学家,这位被马克思斥之为“小布尔乔亚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①在其史学代表作《法国人史话》中毫不吝啬地批评查理七世:“查理,这个懒惰(indolent)、并且浅薄(facile)、懦弱的(débonnaire)人,总是像往常一样放弃他作为国王的权利”;^②“查理七世是个懦弱(faible)且懒惰的人,一把年纪了还是放不下床第之欢”。^③无独有偶,在梯叶里的名著《第三等级的形成与发展史》中,作者也有意地揶揄了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且用词与西斯蒙蒂一致——懦弱且懒惰(faible et indolent)。^④米什莱的巨著《法国史》在涉及查理七世个人的书写时,虽然没有对他个人提出太多的批评与谩骂,但突出了其“受到很好服务”的一面:查理七世为什么能打赢百年战争?因为他身边有优秀的国事顾问;因为雅克·克尔(Jacques Coeur)为他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因为有贞德。总之,查理七世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他“只需要把自己交给顾问们,并顺从他们的建议”即可。^⑤很明显,米什莱对这位君主也并无好感。

对查理七世批评最为猛烈的是亨利·马丁(Henri Martin)。七月革命后,这位洋溢着浓厚浪漫主义热情的作家转向法国历史的研究与写作。1833—1860年,亨利·马丁创作了数本法国史著作,在经过多次改编与再版后,于1855—1860年汇总成一部16卷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这部《法国史》以优美的文辞和强烈的民族情感著称。在该书第六卷中,他花费大量篇幅讲述圣女贞德和查理七世的活动。^⑥从第一章开始,亨利·马丁便批评年轻的查理七世是一个“怀疑好人、轻信恶人的固执、轻浮的人”。^⑦自1422年继位至1429年贞德解奥尔良之围这段时间里,查理七世并不勤于政事,而是沉湎于爱欲与玩乐,他的臣子们、战士们则为了这个国家不断操劳,这一对比的写作手法凸显了查理七世的昏庸。1429年,贞德出现在查理七世的视野中,但是查理七世和佞臣们以其“傲慢、自私、贪婪”的态度冷落了贞德。此后,贞德被审讯并判以火刑,查理七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与怜悯。

实际上,如果我们“倒放电影”式地评析这部《法国史》,几乎都会认为其并非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该书出现了多处贞德与天使的对话、贞德在被俘后的心理活动等描写。尽管这些描写在15世纪的某些一手文献中的确出现过,但是亨利·马丁付梓这一卷《法国史》时已是19世纪中期,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已在法国这片革命的土壤上深入人心,然而他还是将这一类神秘故事写进了史书。这也体现了其《法国史》在史料的批判使用上仍然存在缺陷。

上述这些法国通史类作品在19世纪上半叶均取得较大成功。如亨利·马丁的《法国史》,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494页。

② Jean de Sismondi, *Histoire des français*, Treuttel et Würtz, 1831, p. 71.

③ Jean de Sismondi, *Histoire des français*, p. 461.

④ Augustin Thierry,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état, suivi de deux fragments du Recueil des monuments inédits de cette histoire*, Furne Libraires, 1853, p. 91.

⑤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5, Libraire de l'Université de France, 1841, p. 222.

⑥ 1855年出版的第六卷《法国史》共588页,6章,讲述上迄1415年亨利五世入侵,下至1465年大公益联盟战争(Guerre de Ligue du Bien public)之间的历史。每章覆盖范围均约十年,篇幅均约百页。其中第三章是个例外,作者用了117页的篇幅专门讲述1429—1431年贞德活动的历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亨利·马丁对贞德的重视。Henri Martin,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vi, Furne Libraire, 1855, pp. 585—588.

⑦ Henri Martin,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vi, p. 91.

数次获得由法兰西美文学院颁发的戈贝尔奖(Le prix Gobert),^①这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领域的最高奖项。米什莱等史学家也对他表示赞许和鼓励。但是,这些作品普遍存在着较大问题。首先,这些通史作品使用的一手史料性质的参考文献并不多,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些学者们对查理七世的认知。在写到查理七世时期的统治时,他们几乎都使用了以下几种一手史料:让·沙尔捷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编年史》(*Chroniqu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无名氏的《一个巴黎市民的日记》(*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aris*)、^②由朱尔·基舍拉(Jules Quicherat)校勘整理的《贞德的定罪与平反一案》(*Procès de condamnation et de ré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18世纪校勘的《法国国王诏令集》(*Recueil des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以及国王与贵族们的书信集等,但还是有数种重要的一手文献未得到校勘,这些历史学家们也未能窥之,如托马·巴桑(Thomas Basin)的《查理七世史》(*Historia Caroli vii*)、昂盖朗·德·蒙斯特勒莱(Enguerran de Monstrelet)的《昂盖朗·德·蒙斯特勒莱的编年史》(*le Chronique de Enguerran de Monstrelet*)等。让·沙尔捷的编年史倒是在这之前便校勘出版。1661年,一位名叫德尼·若弗鲁瓦(Denis Geofroy)的文献学者校勘并印刷了沙尔捷的编年史,但他只印刷了编年史的第一卷,而这一卷只记载了1422—1431年的历史。这也导致尽管沙尔捷在编年史的中后段对查理七世的正面描写很多,但这些记载仍然不为人所知。^③

其次,这些作品在写作上的主观性过强。这些作品不仅充斥着大量文学化的形容词和心理、神态描写,还出现了多处情节和语言上的虚构。需要指出的是,在浪漫主义史学家们参考的一手史料中,查理七世形象并没有非常糟糕。让·沙尔捷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编年史》中着笔最多的便是查理七世与贞德。在涉及贞德部分的写作时,沙尔捷并没有太多地对贞德作出文学化的夸赞,也并未用大量的人物细节的描写和文学化的形容词来描绘查理七世,只是记载他们在1429—1431年的部分言论与种种行动。该书的笔墨更多地放在了查理七世统治时段的后半期。^④在该书中,进入统治后半阶段的查理七世是一个颇有才干的君主形象。《一个巴黎市民的日记》中则少有对查理七世个人的记载,而国王诏令更是一种情感与立场十分中立的史料。^⑤因此,这些浪漫主义史学家们对查理七世的情感判断,不存在来自史料本身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些历史学家们是有意为之:他们的目的并非客观、真实地写作,并力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为了给公民们传递爱国的价值观。贬低

① 参见这一卷《法国史》扉页。

② 该书在1824—1829年由让·亚历山大·布雄(Jean Alexandre Buchon)主持校勘出版。

③ Jean Chartier, *Chroniqu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éd. Vallet de Viliville, P. Jannet, 1863, notice xxij - xxiii.

④ 文献学家瓦莱·德·维里维耶(Vallet de Viriville)指出,由于让·沙尔捷于1437年才被查理七世任命为太史令(historiographe officiel du roi),而在这之前他并没有记述(至少无证据表明)查理七世登基后的历史,因此,涉及查理七世在兰斯加冕前的史实,他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库西诺《法国贵族的史诗》中的相关内容。维里维耶的论断可从该编年史的篇幅得到旁证:1437年之前的内容、特别是15世纪20年代的部分内容明显比1437年之后的内容简略。参见Jean Chartier, *Chroniqu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notice xxx。

⑤ 就15世纪上半叶现存的其他史料而言,查理七世本身的形象是较为扑朔迷离的,既有不少赞颂他的文本,如乔治·夏特兰的《奇迹》(Georges Chastellain, "Merveilles", in Kervyn de Lettehoove, éd., *Œuvres vii*, F. Heussner, 1866, p. 194),也有贬低他的文本,如《奥尔良围城战秘史》(MM. F. Guessard et E. de Certain, éd., *Le mystère du siège d'Orléans: publi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près le manuscrit unique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du Vatican*,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2)。这可能与作者们不同的政治立场、社会认知、个人经历以及写作需求有关。这些文本一部分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使19世纪的法国人也有机会接触,不过,就笔者所见,19世纪上半叶的通史中并没有使用上述任何材料作为参考文献。

查理七世,尤其是着力描写他对圣女贞德见死不救的写作方式,既强化了贞德的古典悲剧式的传奇效果,也能调动读者们愤懑的情绪,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读者们也不知晓、可能也并不在意他们的叙述是否真实。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将15世纪的历史写成纪传体小说式的文学作品也合情合理。^①

从上述多部浪漫派法国通史类作品可以看出,查理七世在19世纪中期以前已被构建成一个无能的、负面的庸君。不过,鉴于这些著作充满了文学性与主观性,其塑造的查理七世形象是否与史实相符,仍有待证实。这一证实工作在随后不久便得以展开,发起者则来自另一个领域——国立文献学院做文献校勘工作的学者们。

二、大论战与查理七世历史叙事科学化转向的展开

法国是欧洲最早开展文献校勘工作的国家之一,这一风潮和法国17世纪古今之争时期的“博古”风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和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息息相关。^② 路易十四登基后,法国的文献校勘工作发展较快,整理校勘了如《法兰西国王诏令集》等重要档案,^③其中包含查理七世时期颁布的所有诏令,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开展文本写作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相关工作暂时进入低潮,直到路易十八复辟后,政府才重新开始支持法国历史文献的校勘工作。在这之后,多种历史文献得到发掘与校勘。

1821年,国立文献学院建立,这标志着法国的文献校勘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机构主导了多项中世纪的文献校勘项目,也培养众多文献校勘方面的人才。朱尔·基舍拉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④他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在1841—1849年校勘了贞德被俘后的诉讼档案,并将之集结为五卷本的《贞德的定罪与平反一案》。此外,1855年,基舍拉还主持校勘了托马·巴桑的《查理七世史》,并以原本的拉丁文形式出版。1856年,路易·杜埃·达尔克(Louis Douët d'Arcq)校勘昂盖朗·德·蒙斯特勒莱的编年史出版,这一编年史创作于1440—1444年,主要关注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特别是勃艮第地区的历史。^⑤ 上述一手文献的校勘为查理七世历史叙事的科学化奠定了文献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学院的学生培养模式。在一份19世纪60年代文献学院的工作报告中,时任

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文本的创作中,小说家们多使用直陈式简单过去时(Indicatif Passé simple)这一时态写作,而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文本时,多使用未完成过去时(Imparfait)与复合过去时(Passé composé)写作——这同样是当代法语作家与法语世界的史学家写作的惯例。从语法角度来说,简单过去时多用于虚拟故事的写作,而后两者一般用以阐释过去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从侧面说明,史学与文学的写作在19世纪初期存在区别,且历史学家们也意识到这一写作上的区别。

② 相关研究与论述,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第182—191页;晏绍祥:《18世纪欧洲关于古典世界历史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③ 这项工作至今仍在持续中,已成为法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这一工程,2009年有学者撰写了题为《法兰西国王诏令的出版:一项历时三百年的工作》的回顾。参见Baudouin-Matuszek Marie-Noëlle, “La publication des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trois cents ans de travaux”,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Tome 167, 2009, pp. 487—537。

④ 也有学者提出,基舍拉同样是19世纪中期法国史学研究转向的重要人物,但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他校勘了众多文献而不是方法论层面的贡献。参见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p. 82。

⑤ 参见Jules Quicherat, *Procès de condamnation et de ré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 5 Tomes, Libraires de la société et l'histoire de France, 1841—1849; Thomas Basin, *Histoire des règnes de Charles VII et de Louis XI*, éditée par Jules Quicherat, Librair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55—1859; Enguerrand de Monstrelet, *Chronique*, éd. Louis Douët d'Arcq, Renouard, 1857—1862。

文献学院副院长的瓦莱·德·维里维耶阐述了文献学院对在校生的培养方案:学生们入学后,需要学习拉丁语、逻辑学、手稿与印刷文献的分类等“历史辅助学科”,这些课程都是为了整理、翻译、解读古典与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手抄本服务。此外,学生们还需要学习古钱币学、古地理学等知识。^①关于办学宗旨,维里维耶在这份工作报告中表示,文献学院是“为了国家服务,培养各个等级的公务员”,这主要指以下两个就业方向:“能够探索这个国家历史与渊源的自由或博学的学者”和“公共档案馆与公共图书馆的馆长”。^②

从这份工作报告来看,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时期文献学院所设课程是否包含历史,但毫无疑问,学院并不教授学生如何开展历史文本写作的技艺,^③且其教育宗旨也并非是将学生塑造成米什莱、亨利·马丁这样的历史学家,而是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公务员或国家历史的专业研究者。以文献档案作为研究对象,也在潜移默化中使文献学院培养的人才养成了以研究材料为基础与中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良好习惯。

需要注意的是,文献学院从成立之初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学术阵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献学院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这可能与文献学自身的基督教——博物学这一学术谱系的传承有关。第二,文献学院是路易十八钦赐设立的,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教学宗旨均是为了探究“法国君主制时期的昔日荣光”,在教学中亦贯彻了“对君主忠诚”的教学理念。^④此外,从物质角度看,学院教师的待遇颇为丰厚,在读学生不仅免费入学,还可获得政府颁发的生活补助。^⑤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文献学院的师生大多信仰天主教并支持君主制。

文献学院培养了诸多文献学领域的学者。在校勘、研读大量的一手文献后,诸多学人均感受到亨利·马丁在《法国史》中对查理七世的叙述过于主观,评价过于苛刻,以致于歪曲了事实。于是,他们陆续撰文驳斥亨利·马丁的《法国史》,其中以两位学者最具代表性:分别是上文提及的、时为文献学院助理教授的瓦莱·德·维里维耶与文献学院的在校生加斯东·杜·弗伦·德·博库尔(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维里维耶主要从事中世纪晚期的文献档案整理工作,1837年毕业于文献学院。1838年,奥尔良王朝的公共教育部任命他进行一项圣女贞德与查理七世时期的文献整理项目,这个项目在随后的20年间整理出大量15世纪的手抄本并陆续以印刷本出版,其中包括纪尧姆·库西诺撰写的《贞德编年史》、让·沙尔捷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编年史》等。^⑥

维里维耶是法国学术界最早在查理七世研究领域对亨利·马丁的《法国史》展开公开批驳的学者。1856年,他在该年度《文献学院丛刊》的第17卷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仅千余字的书评

① Vallet de Virville, *L'école des chartes: son passé, son état présent, son avenir*, Imprimerie CH. Schiller, 1867, pp. 5-9.

② Vallet de Virville, *L'école des chartes: son passé, son état présent, son avenir*, p. 5.

③ 一个潜在原因是文献学院可能没有引进相关领域的师资。维里维耶在这份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我们学院的某一位老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的表述,但并未提及历史学领域的专家。

④ M. le baron de Gérando, “Pièces justificatives, faisant suite à la notice historique”,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Tome 1,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artes, 1840, p. 31.

⑤ M. le baron de Gérando, “Pièces justificatives, faisant suite à la notice historique”, pp. 36-37.

⑥ 参见 Guillaume Cousinot, *Chronique de la Pucelle*, éd. Vallet de Virville, Slatkine-Megariotis, 1976; Jean Chartier, *Chroniqu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éd. Vallet de Virville, P. Jannet, 1858。需要指出的是, la Pucelle 在中古法语中特指贞德,现代法语亦然。

中,维里维耶指出亨利·马丁的写作与史载出入颇多,导致其写作“偏离了事实与历史文本本身”。例如,亨利·马丁说,1436—1440年发生的“假贞德”一案引发的舆论,迫使法国王室最终撤销了对贞德的指控。^① 维里维耶指出,这一结论夸大了民众言论对王室的影响。^② 又如,贞德被俘时,查理七世熟视无睹,甚至到死都没有为此而愧疚,亨利·马丁据此认为查理七世是一个冷漠的人。因此在写作时,他大段大段地对查理七世进行谴责,维里维耶认为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足。^③

维里维耶认为,亨利·马丁的写作非常主观,甚至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指出,“贞德的故事变成了一种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的指导下,描绘查理七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成了谴责或诘难的话语。出于一种夸大的正义,马丁先生有时会把查理七世的整个统治置于令人愤懑的偏见之下,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我对马丁先生所言并非杜撰。”^④

维里维耶以充分的理由指出亨利·马丁写作中存在史实错误、写作过于主观等问题。实际上,这并非维里维耶针对亨利·马丁《法国史》发表的第一篇书评。1855年,他已经在《文献学院丛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高度评价亨利·马丁《法国史》的第一卷:“该书清晰地展现了早期高卢人的生活方式”“马丁先生的写作重视了口头传说,它们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且称赞“马丁先生的书赢得法兰西学院的一等奖(Premier Prix de l'Académie,即戈贝尔奖)是实至名归”。^⑤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维里维耶对亨利·马丁《法国史》的评价秉承的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如果说维里维耶的批评还算委婉的话,那博库尔的批评可以说毫不留情。后者出生于1833年,1856年5月,年仅23岁的博库尔出版《查理七世的统治:根据亨利·马丁先生和当代的材料》(以下简称《查理七世的统治》)。从标题便可看出,博库尔将矛头直接对准亨利·马丁。他在该书的第一段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学家的写作可以去鼓励真理、公正与伟大的精神,但是这不能建立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观念”之上,否则便是一种“错误的行为”。^⑥ 紧接着,初出茅庐的他对亨利·马丁展开了猛烈嘲讽:“那么,在这个领域排名第一的历史学家是否这么做的?他在撰写历史著作之前,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是否抛开了那些偏见,真地做到了公正地写作?”^⑦

随后博库尔阐明自己创作《查理七世的统治》的目的:他希望“恢复这一时期的历史真相”。因为他觉得,亨利·马丁的《法国史》中虽说充满了激情、正义,但这份激情和正义被夸大了。“在这部书中,光线没有调整到很合适的状态,阴影则被无限放大了,这牺牲了这幅油画原有的真实性”,而查理七世统治的年代“被严重地歪曲了”。^⑧

博库尔接下来试图给查理七世“翻案”。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将目光聚焦在查理七世早年的统治(1422—1435年)。他指出,亨利·马丁对查理七世的指责并不成立,其描述中夹杂了太多的个人

① 参见 Henri Martin,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6, p. 354.

② Auguste Vallet de Viriville, “Histoire de France... , par Henri Martin.”,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Tome 17,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école impériale des chartes, 1856, p. 385.

③ Auguste Vallet de Viriville, “Histoire de France... , par Henri Martin.”, p. 385.

④ Auguste Vallet de Viriville, “Histoire de France... , par Henri Martin.”, p. 385.

⑤ Auguste Vallet de Viriville, “Histoire de France... , par Henri Martin.”, pp. 472 - 474.

⑥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Durand, 1856, pp. 1 - 2.

⑦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pp. 2 - 3.

⑧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pp. 3 - 4.

情绪。第一,查理七世早年就是一个勤于政务的君主,他并非《法国史》中所说的那样贪图享乐。第二,查理七世的确得到了很好的服务,但这不能证明他是一个懒政君主,相反说明他用人不疑、慧眼识才。第三,早年的查理七世是不幸的,他面临的是一个国土沦丧、田园荒芜的国家,他也在努力地维系着孱弱的布尔日政权——尽管效果有限。因此,将国运衰微的责任归咎于查理七世并不公正。^①

第二章中,博库尔指出,亨利·马丁关于贞德的写作太过浮夸。在《法国史》中,他用大量笔墨去写贞德与上帝、天使之间的对话,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此外,在那个年代,贞德被判处火刑完全符合情理。15世纪仍然是一个宗教至上的时期,理性主义、科学思维并没有建立,故亨利·马丁不能就此感叹查理七世时代是一个昏暗的时代。^②

在该书的结论中,博库尔表达了自己对查理七世及其时代的评价:在查理七世时期,法国“终于能够喘口气,摆脱有史以来最沉重、最漫长的枷锁”,也正是从查理七世开始,法国逐步走向富强。“这样的一位君主应该得到历史学家们崇高的、合法的赞扬。”^③就此,博库尔给查理七世的“翻案”工作暂告段落。但是,他的目的似乎不限于此,在结论中,他还探究了“褒贞德贬查理”现象背后的原因:长久以来,在历史文本的写作中,作者们并没有秉承公正、客观的原则,而是出于自己的偏见在写作,以论带史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先拟出一个写作计划,即先入为主地搞出一套系统,然后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把这套系统连接起来。”^④对于这一现象,博库尔也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法国史写作的观点:诚然,圣女贞德是一位伟大的英雄,是她将法兰西民族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但是,历史书写不能为了凸显圣女贞德的伟大便矮化查理七世等其他人物。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撰写的作品当然可以歌颂法兰西这个伟大的国家与民族,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客观叙述、公正评价的基础之上。^⑤

博库尔对亨利·马丁《法国史》的攻诘有着充足的理由。首先,他所掌握的一手史料远多于亨利·马丁,这使他具备了比亨利·马丁对15世纪历史的理解和认知更深入的条件。1856年,维里维耶校勘的《贞德编年史》、完整版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编年史》等一手文献虽未出版,但在这部《查理七世的统治》中已经作为参考文献引用。博库尔本人也已经着手校勘马蒂厄·戴斯库西的《编年史》(*Chronique de Mattieu d'Escoucy*),而这些文献在亨利·马丁撰写《法国史》时并未引用。其次,在《查理七世的统治》中,博库尔的论据十分充分,论证逻辑也符合一个批评文章该有的架构。最后,如前所述,除了维里维耶,1855—1857年有多位学者与博库尔站在同一阵线批评这部《法国史》,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质疑《法国史》的客观性。^⑥1857年9月15日,亨利·马丁撰文,对这一批“论战文章”统一做出回应:他写了一篇长达50页的文章《近期关于贞德的批判性研究》,刊登于《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并同步收录在亨利·马丁同年出版的著作《圣女贞德》中。在该文中,亨利·马

①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Chapitre 1.

②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Chapitre 2.

③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pp. 111 - 112.

④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p. 113.

⑤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Chapitre 4.

⑥ 这些代表性文章及作者如下:Louis de Carné, “Jeanne d'Arc et sa mission d'après les pièces nouvelles de son procès”,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29 - 1971), Vol. 1, No. 2, 1856, pp. 310 - 348; M. Nettement, “une polémique récente à l'occasion de Charles VII et de Jeanne d'Arc”, *Union*, 2 et 26 juillet 1856; E. Chasles, “Une question de justice historique”, *Revue Contemporaine*, 30 juin 1856; 等等。

丁表示,“很高兴自己的文章引来了大家对于这一主题(即贞德)的关注”,^①但显然他并不打算就此承认自己的作品存在上述学者指控的种种问题。相反,他对这些驳斥文章一一作出点评,并指出他们在写作中的问题。他指出,博库尔所言的查理七世“日理万机”是一个勤政的好国王缺乏证据,并认为他是为了驳斥而驳斥。^②博库尔自然不甘示弱。是年,他又出版《给亨利·马丁的最后通牒》,并毫不留情地对亨利·马丁展开批判,他甚至一条一条列出亨利·马丁《法国史》中世纪部分的所有史实错误并逐个驳正。^③双方的论战仍未休止。^④

如果说西斯蒙蒂、亨利·马丁等人笔下的15世纪上半叶历史是灰暗的、不客观的,那么重新还原那个时代的面貌,并给查理七世一个公正的评价,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简短的书评和火药味浓厚的书信,因为其篇幅有限且价值判断色彩太重,并不能全面、公正地还原15世纪的社会图景与人物面貌。相比之下,重新创作令人信服的新作品才更有说服力。在与亨利·马丁的论战逐渐平息后,维里维耶与博库尔继续投入法国中世纪文献的校勘与相关历史的研究中。1859年,维里维耶出版了研究查理七世的新书《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与他的顾问们(1403—1461年)》,该书仅63页,只是简短地围绕查理七世的生平做了介绍。^⑤他更大的贡献体现在1862—1865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与他的时代史》(以下简称《时代史》)。在这之后的1881—1891年,博库尔亦撰写了六卷本的《查理七世史》。^⑥相比19世纪上半叶的通史著作,这两部作品使用了更多的一手史料,对查理七世时期的历史展开了详细论述。

《时代史》与《查理七世史》的陆续出版,实质上宣告了文献学家与浪漫派史学家关于查理七世历史叙事论战的终结,也意味着文献学家在双方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论争给法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又该如何评价维里维耶、博库尔等文献学者在论战中的著述与治学思想?

三、查理七世历史叙事论争案在法国史学史中的意义述评

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知识与话语争端的背后是权力争端,这一论争也不例外,它可被看作文献学院这一保皇派、天主教的学术阵营,与浪漫主义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19世纪中期以前,米什莱、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法国史坛备受瞩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浪漫主义话语霸权。然而,他们在强调历史与人类发展的“进步性”,称颂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人类理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文献学院的师生们所秉承的天主教传统的反对;在提倡充分发扬人的“主体性”,并以此指导历史写作时,也必然导致其思想倾向的过度泛滥,以致于贬低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⑦

① Henri Martin, “Des récentes études critiques sur Jeanne d’Arc”, *Jeanne d’Arc*, Furne, 1857, p. 327.

② Henri Martin, “Des récentes études critiques sur Jeanne d’arc”, pp. 327—376.

③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Un dernier mot à Henri Martin*, Durand, 1857, pp. 9—10.

④ 此后仍有零星学者对亨利·马丁展开批判。参见 Henri de L’Epinois, *Critiques et Refutations: M. Henri Martin et son Histoire de France*,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bibliographique, 1872。

⑤ M. Vallet de Virivill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et ses Conseillers, 1403—1461*, Demoulin libraire-éditeur, 1859.

⑥ Vallet de Viriville,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et de son époque, 1403—1461*,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62—1865;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bibliographique, 1881—1891.

⑦ 参见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5—220页。

上述特征在亨利·马丁的《法国史》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也顺理成章地遭到接受传统学术训练的文献学家们的批判。从历史观角度看,文献学家认为,这种称颂新时代、批判旧时代的反传统、反教会、反君主制的写作思想割裂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文献学者亨利·德·勒皮诺瓦在批判亨利·马丁时说道:“旧法国结束,新时代开始——这是一个反爱国、反哲学、反历史的表述,因为每一个世纪都继承了前一个世纪的遗产,每一刻都意味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过渡。”^①从方法论角度看,文献学家们也不认可浪漫派历史学家借贞德牺牲等事件对宗教与旧君主展开超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层次的批判,因为这与他们所受的以文献档案为中心、不可肆意抒发情感的学术训练相悖。他们指出:“在理性主义者启发下的历史书写通常无法提供真实的、基于事实的描述,因此也无法提供学习的手段。在他们的笔下,历史成为一种战斗武器,一种过度激发激情的宣言书。”^②这也是维里维耶、博库尔、勒皮诺瓦等文献学家向浪漫主义史学家发起论战的深层次原因。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论战也是19世纪中期法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学术圈的映射。

必须承认,尽管对峙双方各有其倾向性,但这场论争,以及之后维里维耶、博库尔等文献学家的历史书写,在客观上对法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一,就文献学家们在论战中的相关言论以及之后撰写的相关著作来看,其学术观点、研究范式已经带有较为鲜明的实证主义史学特征,与兰克的史学方法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19世纪法国史学界“如实直书”的较早呼声,也是最早的尝试,是法国史学的进步。

首先,二者都十分注重书信、档案、编年史等一手材料的批判与利用。众所周知,在兰克的学术研究中,档案材料的阅读与使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强调“历史科学要对事物进行搜集、发现和深入探讨”。^③无独有偶,博库尔等文献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历史写作是一种严肃的行为,它应是批阅了众多档案后结下的果实。”^④

我们从以下选自维里维耶《时代史》的例子可看出这一点。查理七世与其情妇阿涅斯·索蕾(Agnès Sorel)之间的风流逸事是后世历史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后者也常以“红颜祸水”这一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文本中。如,15世纪编年史学家乔治·夏特兰便对阿涅斯·索蕾多有批评,认为其“私德甚差”。^⑤但是,这与路易十一时代遗留下的某些一手文献的说法迥然不同。维里维耶研读了夏特兰的记述,指出他在此处写作使用的语言拼写方式、文字风格与夏特兰的其他作品差异甚大,而夏特兰对阿涅斯·索蕾亦不了解。另外,这些记述又与路易十一早年遗留下的一份笔记在情感立场、语言拼写方式等方面吻合度甚高。因此,维里维耶推断,夏特兰在此处可能参考了路易十一的说法。此外,维里维耶又在比对和分析15世纪史学家罗贝蒂·加圭尼(Roberti Gaguini)的《年鉴》(Annales)、托马·巴桑的《查理七世史》后指出,路易十一对阿涅斯·索蕾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他早年嫉妒其父与这位有着姣好容貌的情妇的关系,也对这位“红颜祸水”多有记恨;但当他成熟、年长之后,慢慢理解了这位父之所爱。而就路易十一晚年留下的文献来看,他亦对阿涅斯·索蕾多有称

① Henri de L'Épinois, *Critiques et Refutations: M. Henri Martin et son Histoire de France*, pp. 474–475.

② Henri de L'Épinois, *Critiques et Refutations: M. Henri Martin et son Histoire de France*, p. 472.

③ 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编者导言”,第3页。

④ Gast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 p. 2.

⑤ Georges Chastelain, *Chroniques des duc de Bourgogne*, Tome 7, éd. J. - A. Buchon, Panthéon Paris littéraire, 1837, p. 255.

赞,这也印证了维里维耶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①

其次,兰克史学观的核心是“如实直书”,在兰克看来,历史研究便是用尽可能多的史料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站在历史之外”公允地叙述历史是历史学家必备的职业操守,^②从本文聚焦的两位文献学家的著作、述评等来看,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下面一个例子取自博库尔《查理七世史》,我们可以借此管窥博库尔是如何做到“站在历史之外”的。西斯蒙蒂曾经指出,查理七世在1440年机敏地处理了布拉格雷叛乱(Praguerie),这体现了他从懦弱到自强的转变:他开始在政事中发挥作为君主该有的作用。^③这一点在沙尔捷的编年史中也得到了体现。^④与此同时,博库尔发现并列出了一份博韦主教写给查理七世的书信,该信显示那个年代的贵族对查理七世普遍有着较大的不满,他们认为查理七世对于王国事务并不热心,未尽到一个国王该尽的责任。这份以手抄本存世的一手史料对西斯蒙蒂和沙尔捷的结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博库尔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对西斯蒙蒂的结论和博韦主教的书信做了批判:他认为前者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敏锐地指出,“不要用自己自己的眼睛来看,因为这样有被欺骗的风险。”^⑤同时,博库尔在参考乔治·夏特兰的编年史等史料后,提醒“我们不宜夸大这些批评(指博韦主教书信的批评)的范围”。^⑥可见,博库尔并不想参与这一评价,而是尝试跳出这一窠臼,并指出双方在认知方面的局限。

实际上,这也是博库尔与启蒙史学家、浪漫派史学家在史学科学化探索中的根本区别。启蒙史学家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等在写作时也会使用脚注,有的学者也注意到史料的批判使用,但他们离“在叙述中避免显露史学家的主观立场”还存在一定距离,而这才是“科学史学的另一种境界”。^⑦从这一角度出发,以博库尔为代表的文献学家们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兰克主义影响了维里维耶与博库尔呢?实际上,几乎在维里维耶、博库尔等参与查理七世历史叙事论战的同时,兰克学派也逐步传入法国。^⑧可以确定的是,博库尔撰写《查理七世的统治》时(1856年)一定知晓了兰克及其研讨班的学术活动。^⑨但是,维里维耶、博库尔作品中提倡如实直书、公正客观的理念并不是完全源于兰克学派的影响,而是更多地源自兰克学派以外的

① Vallet de Viriville,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et de son époque 1403 - 1461*, Tome 3, pp. 188 - 189.

② 胡昌智:《论兰克的史学思想》,《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

③ Jean de Sismondi, *Histoire des français*, Tome xiii, p. 311.

④ Jean Chartier, *Chronique de 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 pp. 252 - 259.

⑤ Gasd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Tome 3, p. 135.

⑥ 参见 Gasd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Tome 3, pp. 135 - 142.

⑦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第222页。

⑧ 关于兰克学派传入法国的详细过程,参见顾杭、庞冠群:《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⑨ 据博库尔《查理七世的统治》:“自本世纪初开始,有一个新的学派宣称要重新研究历史上的一切,他们发表了诸多论文并尝试理论上的创新。”根据上下文,博库尔在此处想要表达的是他强烈希望历史研究应该不偏不倚,客观阐释,而兰克学派符合这一条件。后文所说的“这一学派回到了被忽视的起源”也与兰克提倡的回到档案中去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 Gasd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p. 114。除此之外,1854年,已有人在《两个世界杂志》撰文介绍兰克与其史学思想。参见 Saint-René Taillandier, “Historiens modernes de l'Allemagne, Leopold Ranke”, *Revue des Deux Mondes*, 1 avril, 1854, pp. 37 - 72。《两个世界杂志》是法国19世纪中期重要的学术杂志之一,也是这批文献学家与亨利·马丁展开论战的“主战场”之一,作为时任文献学院助理教授的维里维耶与在读学生的博库尔,不可能不知晓这篇文章。故可断定,他们二人在1857年之前应对兰克其人及其史学方法论有所耳闻。

因素。首先,这一理念源自他们作为文献学家的职业素养。维里维耶与博库尔并非纯正的历史学者,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文献校勘,可以说与历史写作有天壤之别,而兰克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其对于文献学家的本职工作几乎不存在指导意义与学习价值。其次,从博库尔在《查理七世的统治》中的阐述来看,他对这个“新的学派”并不完全了解,甚至有一种“隔行如隔山”般地疏离。^①因而,他也没有在本书或其他作品中表明或提及他的工作受益于兰克的方法论。最后,虽说双方有相同的学术理念,却有不同的发轫背景。兰克的理念多源于德国学界的提倡,从威廉·冯·洪堡开始,强调“学术的客观性”这一观念逐步在德意志青年学子间流行,也影响了兰克的学术取向。^②文献学家则不然。他们的学术理念既发轫于文献学的培养模式和研究范式,也和他们对浪漫主义史学的不满有关。不同的发轫背景也导致双方学术旨趣的诸多差异。比如,兰克认为历史写作需要优美的文辞,但博库尔等文献学家并不关心文笔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他们所反对的浪漫派历史作家们关心的事情。

第二,这一论争对法国中世纪晚期史研究也有重要推进。论争渐平后,两位文献学家致力于对查理七世时代的历史展开书写,这些作品详细地阐释了查理七世的生平与其统治期间的历史图景,是后世相关学者无法绕开的奠基性研究。不仅如此,这一论争与相关作品促成了一次中世纪晚期研究范式的转向:在此之前,无论政客、文人、普通读者,还是如亨利·马丁那样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对15世纪法国史的关注都是基于对贞德的关注,历史叙事的体系、历史人物的塑造也都以贞德为中心展开,而这两部断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去贞德化”的工作,促进了学界的研究从贞德这一英雄人物为中心,到以查理七世时代的政治经济风貌为中心的转变。

除上述贡献外,博库尔等文献学家的学术活动也对拉维斯等后世史学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1866年,博库尔创办《历史问题杂志》(*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杂志在法国学术界随即取得声望,并很快迎来了学习者:1876年,实证主义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莫诺创办了《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s*),便是效仿《历史问题杂志》的办刊模式。莫诺在发刊词中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们创办《历史杂志》就是为了和《历史问题杂志》相比较。”^③此外,19世纪下半叶,博库尔作为文献学家群体的中心人物,引领新一代文献学者继续开展校勘工作,并贡献了很多高质量的成果。拉维斯在其著作中也高度赞扬博库尔等文献学家的学术作品的质量。^④

当然,文献学院的学人们在19世纪史学中的影响力也不可高估。其一,文献学院作为一个学术阵地体量并不大,学院在19世纪一年只招个位数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从事政府管理或古钱币研究等工作。因而,有限的学术力量使得他们的影响力难以扩展。^⑤其二,19世纪中后期,法国逐步确立共和制,世俗化也如火如荼地展开,^⑥他们的保守主义倾向与时代格格不入。与之相反的是拉维

① Gasdon du Fresne de Beaucour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I, d'après M. Henri Martin et d'après les sources contemporaines*, p. 114.

② 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编者导言”,第13页。

③ Charles-Olivier Carbonell, “La naissance de la Revue historique; une revue de combat (1876 – 1885)”, *Revue historique*, fasc. 2, 1976, p. 331.

④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à nos jours*, Armand Colin, 1894, p. 160.

⑤ 参见文献学院1821—1840年的名册,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Tome 1,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école impériale des chartes, 1840, pp. 43–49。维里维耶的工作报告显示,至少到1867年,文献学院的招生数均维持在个位数,教师人数常年只有七位。参见 Vallet de Viliville, *L'école des chartes: son passé, son état présent, son avenir*, p. 4。

⑥ 沈坚:《世俗化与法国天主教的现代定位》,《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

斯、莫诺等学者积极推动历史教育改革,宣扬爱国主义,逐步成为法国史学界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下,体量微小的文献学家群体在史学界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小,也导致其在19世纪法国史学史研究中较无存在感。

结 语

尽管学界多认为19世纪法国史学的科学转向是由拉维斯等兰克主义者推动的,但至少查理七世这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其历史叙事的科学转向与兰克主义者关系不大,而是文献学家推动的结果。不仅如此,以维里维耶、博库尔等文献学家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在法国较早地提出了历史学家的写作应重视档案、如实直书的理念,也基于这一准则做出了实践,是法国史学科学转向的先行者。只是,在以实证主义史学家为中心的当代史学史论著中,这一群体“失语”了,他们成了实证主义史学家历史叙事的“背阴面”。

这一查理七世历史叙事论争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第一,在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史学界,除了文献学家群体、逐渐式微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和方兴未艾的兰克主义史学家,还有诸如以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史学家、以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为代表秉承科学主义的史学家等流派。那么,这些派别的学者在法国史学科学转向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作用?又该如何定位?

第二,18—19世纪,英格兰、德意志、法国等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由官方学术机构主导的中世纪史料的搜集、校勘工作,^①这些原始抄本的面世必定会影响原有的历史认知,而原始文献的利用又是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在法国史学史和西欧各国的史学史研究中,还有哪些研究对象,也是在兰克学派传入之前便出现其相关叙事的科学化转向,甚至亦是在文献学的影响下产生转向的?如果有,这些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呈现何种特征?笔者期待学界对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高显,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310000)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3版),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0—351页。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path and the generality of world history and adjuste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This process had, in turn, promoted the adjustment and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rchives and the Scientific Turn in Narratives of Charles VII in French Historiography // Gao Yu

In the study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scholars commonly believ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anke School promote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rench academia. But this assumption overlooks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 academic groups.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anke School was introduced into France, archivists and Romantic historical writers, represented by Henri Martin, launched a major debate over the authentic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King Charles VII of France. These archivists opposed the Romantic writers for their overly subjective and demeaning narrative of Charles VII and attempted to evaluate Charles VII impartially and objectively through collating first-hand materials, writing monographs, and other ways. The archivists had left behind many materials such as book reviews, monographs and others, which clearly reflect their academic pursuit of objectivity and truthfulness.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ankean historians, archivists also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scientific tur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f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Yin Mengmeng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Philippines emerged from the resistance against colonial rule. Filipino historians have been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f their national history in pursu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process, it has become Filipino historians'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ir own nation and spread nationalism. In the post-independent era, it was instrumental in foster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rticulating the trajectory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t was adopted to highligh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seek a dialogue with world-historical narrative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Filipino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n the one hand,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society, whose evolving mode of writing mirrors the social changes within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a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ting nationalism, cultiva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tributing to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while facilitating a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iography development,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has maintained its uniqueness to a certain extent, driven by its own sense of miss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t strives to define its own niche within world historiography.